

学术专论

从走方医看前近代中国官民互动与 民间医疗世界

——以雍正、嘉庆朝两起案件为中心

王 静

[摘要] 本文以雍正朝和嘉庆朝两起走方医案件为中心，利用档案中的诸多细节还原走方医迫于生计挟技逐利的日常医疗活动，彰显出清代民间医疗世界的多元面相。由于其流动的生活方式有悖于安土重迁的传统价值观，且常用欺骗性手段招揽生意，加之人际关系复杂，对统治秩序有潜在威胁，故常被视为莠民，时有被盘查甚至卷入官司的风险。这种官民博弈的内在冲突正是小民为求生存的艰难挣扎与官方对其流动为匪的疑惧之间张力的反映。

[关键词] 清代 建昌卖药人 生存压力 官民互动 民间医疗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9)-01-0066-11

当前国内医疗史研究已日渐深入，探究的议题也更为广泛，但医史学者着力较多的是呈现文本化的医学“正统”及由其所建构起来的医疗世界，而民间大量实际的医疗经验则普遍被忽视。学界对曾长期活跃在广大城乡基层社会并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走方医等民间医者群体也较少关注。^①究其原因，一方面该群体构成复杂，较难把握与归纳；另一方面则因资料零散，不成系统。雍正七年（1729）、嘉庆二十一年（1816）发生两起以江西建昌走方卖药人^②为主角的案件，虽皆为冤假错案，却牵连甚广，甚至惊动当朝皇帝。藉由保留在奏折中的数次审讯过程和细节丰富的口供资料，我们可以一窥处于社会底层的卖药人与强势的官方之间的微妙互动，并向复杂多元的清代民间医疗世界投去匆匆一瞥。不妨先来了解一下案情梗概。

雍正七年正月，雍正帝接到湖南辰沅靖道王柔所上密折，内称其于六年十二月初三日巡查边地时见贴有“张宦为母聘医施药，病愈免谢”^③的招子，心生疑窦，即命差役四处访拿，先后

[收稿日期] 2017-11-21

[作者简介] 王静（1986—），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ppwj2005@163.com

① 笔者对清代走方医的状况曾作过一些探讨，参见王静：《清代走方医的医术传承及医疗特点》，《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② 本文所指的建昌卖药人来自江西省南康府建昌县，地处赣西北修水流域，而建昌药帮则以建昌府南城县为中心，位于赣东，二者不可混淆。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8页。

拘到以许英贤为首的六名走方卖药人。据许英贤供称，张天师之叔张易珍于龙虎山拾得兵书，并与江自得等七人歃血谋逆，分散各省招人，且在南岳、鄱阳湖、龙虎山等一带聚集多人，而他们即借舍药之名替江自得招人。然而湖南巡抚王国栋奉命审时许英贤却翻供。雍正帝由此认为此案似属子虚，待各省调查咨复方可定论，并称王柔此举虽属孟浪但公忠之心可嘉。各省官员接下来一番复杂的调查印证了皇帝的推测。至七月，雍正君臣普遍认为本案大致完结，^①孰料案情出现转折，云南发现江自得行踪，且其供述可疑。于是雍正帝给江西巡抚谢旻和湖南巡抚赵弘恩各发一道上谕，命其务必彻查，不得疏纵。经过多方对质，仍是虚惊一场。雍正八年四月，赵弘恩上折奏报所有审讯情形及处理意见，最终结案。

无独有偶，嘉庆二十一年（1816），直隶总督那彦成、提督徐锲先后拿获四批共五十二名走方卖药人，认为其聚集多人，形迹可疑。他们自称均为江西省建昌县人，为谋衣食而远至关外卖药，是本分小买卖人，并无不法情事。但这套说辞并不能令嘉庆皇帝信服，他质疑道，“数千里远行即有加倍之利，长途食用亦恐不敷”，^②怀疑其另有动机。江西巡抚阮元奉命严密访查，核对门牌与烟户册后奏报，这些人都是安分良民。直隶地方官员随即将其释放。

以上两案都涉及“谋反”，直接起因均源于地方官员的警惕，虽最终查明确系乌龙，但从皇帝到各级办案官员均宁信其有，谨慎对待。相对于庞大的人员基数，走方医卷入这样的案件毕竟是小概率事件。那么，他们与官府相处的日常状态是怎样的？这两起案件的触发有何特殊背景？高高在上的皇帝与各怀心思的承审官员有着怎样的立场和差异？对事态的走向有何影响？这些走方医的命运又面临怎样的冲击？他们是否有自己的因应之道？我们可以尝试从对这两个生动鲜活的案例的剖析中寻找一些解答。

一、两案成因探析

此两案中走方卖药人遭受无妄之灾自是冤枉，但地方官员的“小题大做”亦非无因。作为日常监控的对象，官方对走方医行迹颇为警觉，并明显带有偏见，如许英贤一案中，包括雍正帝在内，很多官员都认定其断非良民，洵非善类，^③径称其为“匪类”、“施药奸民”、“奸徒”、“匪棍”、“舍药游棍”等。显然，这对走方医不够公允，那么这种成见是如何产生的？

1. 流动引发的焦虑与官方的日常监管

王柔在看到舍药招贴时，下意识的反应是“疑非善类”，拿获许英贤之后也以“另有别情”逼问，如临大敌。此举似乎有些不同寻常，因为清代国家对医疗市场缺乏有效监管，行医多被视为个人行为，鲜少被直接干预。虽然相较于一般医者，走方医常因用药霸道与贪利骗财而颇受诟病，但显然前述官员对走方医的怀疑和责难并非出于“医”的考量，而有更深层的原因。

在官方倡导安土重迁的传统社会，清代国家对日益增多的耕垦移民尚有顾虑，医卜星相之类的游食者更易被视为不安生理，其四处游走的生活方式本身即缺乏天然的正当性。^④嘉庆帝直言小民轻去其乡，究非善俗，雍正帝也曾颁布上谕劝诫民众知故土可恋转徙非宜。^⑤在官方眼中，他们脱离基层社会保甲体系的有效控制，行踪莫测，因而颇具危险性和破坏性。雍正帝对许英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5册，第868页。

② 《军机处档》，嘉庆二十一年（无日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档案号：048535。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5册，第328页；第15册，第867页。

④ 尽管官方推崇并花费大量笔墨建构定居的、宗法的农业社会理想模式，但事实上“游”在传统中国同样重要，正如龚鹏程所言，“中国古代也不是一个凝固稳定的乡土社会，而是充满了各类游人游民以及游之活动的世界”（《游的精神文化史论》，序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4页。

贤等“断非安分之良民”的判断即基于此。事实上，不仅官府，一般民众对来历不明的陌生人也多心存戒备甚至敌意，由于缺乏知根知底带来的信任感，走方医有时会被当地人盘问医道，遭到驱逐，甚至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乃至殒命，如四川汉州人石守银的遭遇。^①

更重要的是，医卜星相之流常被视为藏污纳垢的罪恶渊薮，对统治秩序具有潜在的威胁，如许英贤伪供中即称张易珍等“都装作舍药、算命、看地、说书各样的人，招人去了”。^②由于经常在外游走，他们社会关系复杂，有些可能为匪，或为秘密宗教的不法活动作掩护，官方恐其煽惑愚民，惹事生非，甚至聚众作乱，图谋不轨，故通常对其保持一定的警惕，在政治敏感时期更是如此。一些精明能干的官员在日常工作中即严加防范，如赵弘恩认为“医卜星相之中多有匪类藏匿，为害地方实非浅鲜，臣到任以来屡饬各属严行稽察，少有可疑立即拿究，臣仍不时留心暗加查访，以为防微杜渐之意”。^③

尽管心存成见，但官方较少直接强力介入包括走方医在内的游民的日常活动，甚至严密盘查都不是常态，如江桐林所言，“（嘉庆）十八年以前、十八年以后各处地方官、营官并不拘拿，今年（二十一年）方始查拿的”。^④究其原因，这与当时人地矛盾尖锐的现实条件下民众的生存压力直接相关，人口流动日趋频繁，鉴于较高的管理成本，官方难以对其保持高压态势。

在清代中期内部省份多数“人满”的情况下，出外耕垦甚至移民者大有人在，^⑤求生计的现实需求占了上风。因江西地少人多，外出谋生的传统由来已久，挟技游食者甚众，走方卖药人即为其一，据张坦麟奏报，“江西百姓向来多习地理医卜，行走四方以谋衣食，而建昌一邑此类尤多”。^⑥这与卖药人供词相吻合，^⑦地方志中的记载亦可为佐证。^⑧官方的劝谕和前辈所受挫折终究未阻挡住求食者的脚步，嘉庆年间据阮元调查，除被抓的五十二人以外，建昌县德政、新城、归义、修智四乡尚有八百零六名沿袭旧俗、四出卖药之人，其规模相当可观。^⑨

这种日常监管的实际状况体现了官方既无法否认民众游食的合理性又对其难以控制的四处游走心怀忌惮的矛盾心态，是民众的生存选择与官方维护统治秩序的焦虑之间张力的反映。

2. 得以成案的特殊机缘

王柔盘查许英贤等的理由是其以天师名义舍药的营销方式形迹可疑，但就像张坦麟调查到的情况，借名舍药乃“走方卖药之故套”，^⑩本不足为奇。只不过由于当时正是曾静案引起雍正帝震怒，对湖南地方官员大加训斥并责令严查的敏感时期，当地官员自然不敢怠慢。嘉庆年间江桐林等也因适逢官方大规模查禁八卦教乱，严密排查可疑人员而难逃厄运。

雍正六年（1728）九月，曾静案发，朝野震动，尽管湖南地方官员积极配合查拿、承审供犯，但皇帝并不满意，增派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协助审讯。湖南巡抚王国栋诚惶诚恐，急需赶紧理出头绪以得到皇帝的认可。在这种情境下，对于王柔声称拿获卖药匪

① 杜家骥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第3册，第1155-1156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第39页下。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第380页。

④ 《军机处档》，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档案号：047855。

⑤ 参阅王跃生：《清中期民众自发性流迁政策考察》，《清史研究》2014年第1期。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册，第661页。

⑦ 如江自得等称“江西人多田少，无耕种恒业，是以习医者多出外卖药，原为糊口生涯，并无别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第249页）；江桐林供“我们建昌人出外卖膏药，是历久本分买卖，总因本县地小人多，营运艰难，所以都在外省做买卖”（《军机处档》，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档案号：047855）。

⑧ 清代南康府建昌县三面环山，耕地稀少，“通较山林地面，殆佔全建强半焉”（光绪《建昌县乡土志》卷12《实业志》，光绪三十三年刻本，第4-5页），而且水旱频仍，“山乡苦旱，湖乡苦潦”（光绪《建昌县乡土志》卷12《实业志》，第3页），“种多获少”（光绪《建昌县乡土志》卷12《实业志》，第1页），很多人无田可耕或耕种所得不敷所用，可见生民之艰。

⑨ 《军机处档》，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档案号：047954；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档案号：048037。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册，第661页。

类一案，虽然他不愿多事，但因奉旨详察亦不敢疏纵。反观王柔，他因处理苗疆事务比较得当而受到雍正帝的赏识，^①王国栋此前在回奏皇帝询问王柔居官情形时也称其“为人虽觉粗率，然熟谙苗务，办事勤敏”。^②此时的王柔可谓春风得意。^③因曾静案诸犯多出在湖南，地方官被皇帝怪罪防范不力，王柔抓获江西籍的卖药人算是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但因其性格急躁轻率，贪功冒进，故对许英贤等屡加刑讯，在并未查有确据的情况下将事态扩大。而江桐林等人的被抓是自上而下地毯式搜捕工作的结果。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林清率八卦教众一度由东、西华门攻入紫禁城。虽然叛乱很快被平定，但嘉庆帝对此高度重视，甚至下了《遇变罪己诏》，官方追剿余犯的行动也陆续有所斩获，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地方官员难免因循敷衍。正因如此，相较于许英贤案的一波三折，官方对江桐林等卖药人的审讯和处理过程相对简单。下文关于案件审理的论述亦主要以许英贤案为例。

此外，当时整个社会中潜滋暗长的不信任感可能对诸多冤案的形成起也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孔飞力曾指出：“一些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它们也许并不涉及经济发展对于生存的无形威胁，但却可以肯定，它们把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④可以想见，在官府大肆搜捕造成的紧张社会氛围下，像走方医这样居无定所的人由于在社区内缺乏联系纽带便很自然地成为可疑分子。

二、两案反映的政治博弈与官民互动

1. 审案过程中皇帝的立场与官员百态

统治秩序的稳定是当权者极为关心的问题，涉嫌谋反便触动了官方的敏感神经。如雍正帝一贯重视缉匪，认为“盗为生民之害，匪为国家之患”^⑤，“就其轻重而论，则匪类为害更甚”^⑥，强调“地方大吏须时刻留心，一有所闻便应根究，若恐招多事之诮及先存波累无辜之虑，皆谬见也”，^⑦“切不可因一时不得踪迹便视为子虚”。^⑧对于确为匪类者，他更是毫不手软，“毋得少存姑息之念”。^⑨当地方上发生重大案件时，他会高度关注审理进度，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方官员的表现不仅体现其工作能力，更关乎忠诚，于是他们大都不敢掉以轻心，而这也符合皇帝的期待。正如雍正帝对王柔实心任事的肯定：“遇此等事，宁防不虞，不可大意玩忽也。汝此实心为国家留意之忠诚，朕甚嘉之。”^⑩

许英贤案伊始便惊动雍正帝，他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整个事情的发展走向，地方官对案情的反馈也会影响其判断。大致而言，雍正对此案的态度经历了以下变化：似属子虚，宁防不虞→不出所料→不必渎奏，不可懈究→滇省新报，似有影响→秉公根究，务得实情；对许英贤等的态度也随之而变：断非良民→咎由自取→无枉无纵。这种转变与他对匪类的态度一脉相承。

① 譬如在湖南养廉银的分配问题上，雍正帝对王柔特意加赏，称“汝任不比寻常道员，而督抚止议给三百金，殊属不通之至，朕已谕与汝五千金养廉以为犒赏之需矣”（雍正《朱批谕旨》第36册，王柔奏折，雍正六年六月，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缩印本）。

② 雍正《朱批谕旨》第17册，王国栋奏折，雍正六年二月。

③ 其实王柔可能并不知道雍正帝内心尚未完全信任他，“朕不能信王柔如汝信张元怀之真切也”，见雍正《朱批谕旨》第17册，王国栋奏折，雍正六年四月。

④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60页。

⑤ 雍正《朱批谕旨》第57册，赵弘恩奏折，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二日。

⑥ 雍正《朱批谕旨》第35册，谢旻奏折，雍正七年十月初六日。

⑦ 雍正《朱批谕旨》第35册，谢旻奏折，雍正七年十月初六日。

⑧ 雍正《朱批谕旨》第35册，谢旻奏折，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⑨ 雍正《朱批谕旨》第57册，赵弘恩奏折，雍正十二年三月初一日。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第42页。

各地官员的表现却呈现出鲜明的个体差异，皆因在对圣意的揣摩中掺杂了自己的立场和私心。湖南巡抚王国栋因查办曾静案的无能表现令雍正帝颇为失望，故对本案认真核查并事无巨细地上奏，却被斥为舍本逐末，“此一件小事讹案，何必屡屡烦渎，总之根本立心，为自己做督抚的见解，所以枝叶之陈奏，一言一事，皆不可问矣”。^①江西官员虽怕皇帝怪罪，但更多的是对案情就事论事。署江西巡抚张坦麟将本案涉及的人、事逐一核实，发现谋反之事子虚乌有，并称当地民众有挟技游食传统，多为良民，含有为其辩解之意，同时也减轻自己失察的过错，他在奏折中使用的罪名为“聚集乡人，造言惑众”和“往来土司，未免滋事”而未提及谋反，大概也是出于这样的心态。但雍正帝对张坦麟埋头于刑名钱谷而疏于缉匪防范颇为不满，在朱批中一再强调，“似此等事，宁信其有，不可疏忽”^②；“此事似属子虚，但地方上凡有此等可疑之事，宁过于慎重何妨，察明无事释放，则人人皆知自谨，亦属防奸之一法，不可视为多生事端也。汝等大吏倘遇此等风闻，必留心察究，万不可疏忽”。^③有些官员则借此案臆测推求，有矫枉过正之嫌，如四川巡抚宪德奏报拿获王三清，怀疑其乃张熙、许英贤同党，被皇帝呵斥“捉获奸民，未经讯究，遂疑为张熙、许英贤案内之犯，殊属可笑之想，汝等意谓但系匪类即不出此二案乎？……何识见卑陋至于此极”。^④署陕西总督查郎阿将拿获的江子文等四名卖药人视为游棍，意欲严惩，被雍正帝阻止：“此事已据本省彻底申明，悉属子虚，不须更加严讯。”^⑤相较之下，惟有鄂尔泰在查案过程中处置得当，既强化对境内游民的日常监控，又能将拿获的走方医区别对待，宽严相济，“凡语言状貌稍似多事者，即请咨解回原籍收管，其懦弱不堪或久经落业者，就近释放安插，仍责成防汛之弁兵巡役加意盘诘稽查，倘有匪类，务必根拿究治，以靖地方”，^⑥其处事公允，应对合宜，最得圣心。

各地办案官员的小心思难逃皇帝的眼睛，雍正帝用人最看重公、忠二字，也反复告诫地方大员当务远大，莫移初志，认为官员的曲意迎合是私心太过作祟，为此七年（1729）四月曾谕群臣不得揣摩圣意而迎合。^⑦曾静案和许英贤案反映出的种种弊端使他对湖南的吏治民风大为不满，因而出手对湖南官场大力整顿，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全部撤换，前按察使郭朝祚因一味宽柔因循、逢迎上司、苟且塞责而被大加训斥继而革职，只有王柔因敢于任事而得到赞许，不久即加按察使銜。这些案件也强化了雍正帝对湖南难治的印象，他后来曾多次特别强调“湖南地方稽察匪类最为要务，留心缉访，不容少懈”，^⑧“此等事在湖南更为切要”。^⑨

2. 夹缝求生：走方医的应对策略

如前所述，走方医在国家强权面前表现出了明显的无力感，但他们也并非完全被动到坐以待毙的地步。从档案中反映出来的情况，他们大致有以下三种应对方式。

第一种，为保命暂时低头认罪，如许英贤。王国栋曾亲自查验，许英贤身带夹伤又患病，有殒毙的危险，在这种处境下畏刑妄供可以理解，我们先来看许英贤的解释：

这张子明、朱文先、何子云、刘公俊、李文魁名目都是夹昏了捏造的。那朱文先人也没得的，何来有聚人在南岳的事？

又供：江自得原是小亲戚，在云南曲靖、大理等府行医，人极安分正经，现在各衙门行走，那吃血、招人的话都是小的畏刑乱供的。那张易珍并没有这个人，因王道说小的既替张家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第374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册，第488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册，第661页。

④ 雍正《朱批谕旨》第34册，宪德奏折，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⑤ 雍正《朱批谕旨》第50册，查郎阿奏折，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5册，第867页。

⑦ 《清世宗实录》卷80，雍正七年四月丙戌。

⑧ 雍正《朱批谕旨》第57册，赵弘恩奏折，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九日。

⑨ 雍正《朱批谕旨》第57册，赵弘恩奏折，雍正八年二月初四日。

舍药，自然张天师给有印票，夹着追要，小的没法，只得捏这鬼名，说是替天师叔子舍药的。如今只求到江西去查，如有个张易珍，小的就全家受极刑也是情愿的。

又供：李次文系小的母舅，是个秀才，现在家教书，从不出门的，江东荣、江东号都是死过的了，刘惟和是小的邻居，在家行医，何黄道会算命，许世朝是小的一家，这几个人也无别事，是小的受刑不起，就把认识的亲族都扯上了，还造了许多鬼名，是实等语。^①

据张坦麟调查，许英贤翻供的内容基本属实。^②他承认根据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捏造了很多人名和事件，而我们通过分析可知，道听途说的民间传闻如鲁魁山之事，以及相信符咒、撒豆成兵、“禳星解化之法”^③等神秘力量的民间小传统也为其编造伪供提供了资源。对照原供可以发现，他将真实与虚构的内容交叉在一起，不乏生动具体的细节，这种真假参半的技巧增强了伪供的可信性，正如戴维斯所言，“提到准确的人物、地点、行为和态度，部分是为了引出支持性的证据，也是为了使故事变得具体可信，即巴特所说的‘事实效应’（reality effect），也是以细节来证明事情的确发生过”。^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许英贤提到了龙虎山得兵书、吃血酒、分往各省招人以及江自得在鲁魁山收服诸“猢猻”等谋逆情事，但他强调这些均为听别人所言，自己不知内情。为了减轻罪责，他还隐去了其撺掇众人挂牌舍药之事。

这份伪供虽表面看来对他不利，但可冀免一时之刑，而且鉴于案情重大，地方官员必须尽快上报，这样他的生死即不能由王柔独断，由于官方要保留人证，王国栋命人善为调治，他得以侥幸存活。再者，事涉谋反，官方迫切需要查明真相，因为“重狱全凭证据，大案当求首犯”，^⑤但这样反而恰可帮其洗刷冤情。

第二种，坚称合法，拒不认罪，但求官方秉公查验。同样面对官方咄咄逼人的追问，嘉庆年间江幅林等人极力强调外出卖药为当地传统，他们试图以定期往返、常规路线、历久本分买卖等种种“日常性”的因素来消解官方对其脱离常轨、可能为匪的疑虑，由此淡化身份的尴尬与可疑性。与许英贤等前辈一样，他们也恳请官方到其原籍调查，验明身份以证清白。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保守谨慎的走方医通过平时的自我禁抑避免贻人以柄，即使不幸被牵连也可减轻所受的冲击，如刘公象等听到江自得邀他们借名舍药时即“疑其言虚祸大，各不允从”，^⑥再如许世朝虽被劝说，但他“并没有挂招牌，也没有向吃药的人说这些话”。^⑦

面对官方的强势和压制，走方卖药人被迫发展出一套应对策略，以自己的方式坚韧地争取生存空间，体现出一种无奈的生存智慧。当然这种挣扎效果有限，许英贤等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几经递解和反复研讯，身心俱疲，李雄河、朱茂黄二人更是无辜送命。^⑧真相查明后，官方仍认为其“藉名卖药擅游各省及土司地方”^⑨殊为不妥，他们最终被勒令由地方官严加管束，不许再外出行医，生计日绌。而嘉庆年间江幅林等人则相对幸运得多，待江西官员核实其身份，查明无不法行为即被释放，亦未受严厉的处罚。嘉庆帝没有禁其游食，而是告诫地方官员“若能随时化导，使渐知勤苦力作，安土重迁，是则良有司之责也”。^⑩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第367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册，第660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6册，第415页。

④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饶佳荣、陈瑶等译：《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0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第380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6册，第416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第48页。

⑧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5册，第919页下；第16册，第416页。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第380页。

⑩ 《军机处档》，嘉庆二十一年（无月日），档案号：048535。该奏折朱批日期为七月二十一日。

三、因小见大：建昌县卖药人与清代民间医疗世界

上文梳理了诸多江西建昌县走方医在雍正朝曾静案与嘉庆朝查禁八卦教乱的特殊背景下被地方官员重点怀疑身陷囹圄的来龙去脉，关注的是其与官方微妙复杂的关系。现在我们换一个观察角度，从“异常”转入“日常”，通过口供中透露的诸多细节大致勾勒出其行医卖药的概况，并从清代社会医疗文化背景的脉络中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

1. 岁岁常为客：建昌卖药人的活动规律

建昌人出门卖药，基本遵循以一年为周期的自然节律，一般每年正、二月间出发，十一月至年底归家，也可能几年不回家。如许英贤从雍正三年（1725）开始外出卖药，在云南待了两年，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回家，^①至六年二月底又结伴多人前往湖广、云南各地，本该年底归家，却被王柔拿获。涂本金首次赴关外卖药是嘉庆二十年（1815）二月出门，十一月内回家，次年二月十八日再次出发。此外，外出可能会因某种原因间断，嘉庆十八年江幅林因腿膀染患疮疥，未能出门，其后的两年在山东沂州一带做买卖，并未出关，嘉庆二十一年二月间又带着侄子、侄婿等人动身前往关外。^②

这些走方医习惯长距离奔走，其主要活动范围在一定时期内基本固定，同时又颇为灵活，符合明清时期江西商人活动的一般规律。^③雍正年间许英贤等主要往西南方向，沿湖广、云贵一线展开。^④乾嘉时期，江西在长江流域的经济优势逐渐减小，而关外对走方卖药人的吸引力日益增强。如江幅林卖药所经之地包括江南、河南、山东、直隶及关东中前所、中后所、宁远州、锦州府、义州、口外三座塔、塔子沟等。^⑤在穿乡卖药途中，他们会随时搜集各地丰歉的消息，以便及时调整路线，如雍正六年（1728年）许英贤等在贵州打听到婺川县饥荒，因盘缠不足，便兵分两路，许世朝改走永定，而许英贤与许世基则回散毛司地方。^⑥江幅林等也是沿途探问，何处丰收即往何处卖药。^⑦

建昌卖药人多结伴而行，通常为同族、同乡、姻亲、师徒关系，这种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社交网络为其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因同为出门求食者，他们之间有天然的亲近感，日常交往较多，如许英贤与江自得对店居住，“因同是江西人，往来熟识”，^⑧江自得与刘公象等同住在萧公祠，“因系同乡同业且为族党，遂彼此相聚”。^⑨他们交流各种信息，有时顺便互相捎带银信等，在生活中也相互帮衬，包括疾病、死伤、官司等大事，如江东荣、江东号兄弟在云南染疫后即多赖其徒弟詹尔文等照料，并最终由他们带回其尸骨安葬。^⑩

2. 祖传医技：建昌卖药人的医术传承与医疗特色

建昌县习医之人挟技求食被外间称为“过路医生”。他们以卖药为主，但一般随身只带少许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第40页。

② 《军机处档》，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档案号：047855。

③ 江右商帮的特征：人数众多，操业甚广，活动地区广泛，资本分散，渗透性极强而竞争力弱小。参阅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第368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第40页、第41页。

⑤ 《军机处档》，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档案号：047855。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第41页。

⑦ 《军机处档》，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档案号：047855。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第39页。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6册，第416页。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册，第660页。

药料，卖完之后，随地另购药材，自行熬煎，许英贤即称“自幼学做膏药”。^①对他们而言，掌握祖传秘方尤为重要。据阮元奏称，建昌人有祖传万应无忧膏药方、光明眼药方及消食顺气散偏方，为当地一大特色。^②其医疗技艺的传承呈现鲜明的家族聚集性和延续性，如许氏、江氏家族，以同乡为纽带的师徒授受也不少见，故走方卖药人主要集中在建昌县西、北山区。

因缺乏对其药方的详细记载，我们只能从名称大概推断他们可能专治某些常见的特定疾病，如关节病、眼病、肠胃病等。据晚清传教士卫三畏观察，“中国最流行的疾病有眼科、皮肤科、消化道的疾病；间歇性发烧也很常见。眼病的比例大大失常，引起人们的注意。……消化不良是常有的事”，^③这与建昌人的祖传药方恰好对症，可见其实用性。他们的医疗方式有些类似于明末清初鄂东、皖西一带的贩痧药人，^④其活动区域也有一定的重合。

凭借简单实用的祖传药方，加上多年行医积累的经验，建昌卖药人治病颇具效验。王柔曾亲自讯问当地服用过许英贤等所舍药物的土民田士和、李应祖等，他们都被治愈，且未付谢钱。建昌卖药人医疗知识与经验的获得主要仰赖口耳相传的师徒授受，尽管他们仅粗通医理但传承的医技相当实用。正如档案中所见，病人未对其表现出明显的排斥，而且，他们一般待治愈后方收钱，对贫穷者甚至免费，这对病人而言几无损失，风险很小，因而颇受欢迎。而从病人的角度来看，相对于自我治疗、土方验方、巫覡祈禳等应对疾病的方式，这些走方医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亦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3. 招揽生意的手段与收入状况

不同于坐等病人上门求治的一般医家，走方医需要主动吸引、招揽客户，为此他们常采用一些带有欺骗性的手段以取信于民众。据赵弘恩奏报，“四川、福建暨本省获解卖药诸犯或假天师名色，或卖道士符纸”。^⑤如江自得在云南行医时曾“假李宦名色贴招施药度日”，^⑥江子文等的行李中还搜出了天师銜姓的印牌，^⑦云南大理拿获的蒋天成，之前曾作道人装束在宾川场子卖药。^⑧可见这些行为在走方医中较为普遍，他们自己也承认“医卜星相徒手出外，借名骗财相沿有年”。^⑨事实上，正因为这些招揽生意的形式可能带来麻烦，有些较为保守者并不愿尝试。

从档案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他们收入差距较大，且地区差异明显，有些人虽付出很多艰辛，但收入未必理想，如许英贤“生意不济”。^⑩当然，总体而言，其状况仍应好于单纯在家务农，如许世朝曾托人带银二钱五分交与其弟许世治完粮，许世基曾一次性寄回家十两银子。^⑪周登柳、董建中等在家售卖膏药只得钱十六七文，至口外可得三十余文，药价是内地的两倍。他们日常所得并不稳定，“每日每人可卖得钱数十文至数百文不等”。^⑫据江帼林供，“我们卖药每人所得利息多寡不等，我现在积得银十六两零”。^⑬而涂本金在天津曾一度因买卖平常当掉棉袄作盘费，不过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第367页。

② 《军机处档》，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档案号：047954；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档案号：048037。

③ 卫三畏：《中国总论》，陈俱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69-670页。

④ 陈曼丽、何双文：《明末清初民间的一种医药活动——贩痧药》，《第十八届全国药学史暨本草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集》，合肥，2015年，第290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第379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6册，第416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5册，第656页。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5册，第327页。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第379页。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第39页。

⑪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册，第660页。

⑫ 《军机处档》，嘉庆二十一年（无月日），档案号：048535。

⑬ 《军机处档》，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档案号：047855。

他虽在关内买卖平常，出关后却“积银十八两零”，^①这一趟总体算下来应该获利颇丰。

4. 清代民间医疗世界管窥

建昌卖药人这样的走方医早已淡出我们的日常医疗世界，至少不被当今主流社会所认可，然而若将该群体放在明清医疗文化背景下考察，我们却更易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明清时期传统中医在知识与人数上都发展迅速，医学流派众多，医生队伍壮大，医药市场扩大，但仍难以应对当时社会庞大的医疗需求，更遑论满足病家较高的期待。大致而言，其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各阶层、各地区可利用的医疗资源差异明显。大致而言，社会上层能延请到更多的医者并买到各种药物，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以及京师、都市往往是医疗资源的聚集地，而下层民众连基本医疗都难以保证，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普遍。加之物价水平和药材价格的地域差异，使得长途卖药获利成为可能。江幅林称其之所以远赴关外，正是因为“北边膏药等项得价，关东及口外食物又贱”。^②涂本金也是因打听到“北边口外食用贱，卖药可以多赚钱”^③转而北上。对于身处医疗资源较匮乏环境下的民众而言，走方医群体的存在也部分满足了其医疗需求。

第二，医疗市场混乱，病家常陷入择医困境。一方面，明清时期医疗资源社会化和医生职业开放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④印刷术的繁荣和大量医学入门书籍的编纂，使得医学知识的获取更为容易，随着医学知识普及化程度的提高，成医途径得以拓宽，尤其便于科举失利的读书人进入医者行列，此外还有很多文化水平不高者，亦可通过自学脉诀、汤头歌诀而习医。另一方面，清代国家在知识和制度上都未建立行医标准和准入制度，也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惩戒手段，国家职能的缺失和医政管理的松弛进一步加剧了医疗市场的混乱局面。有鉴于此，病家对医者的甄别尤为重要，但多数人并不具备该能力，即使可享受到更多医疗资源的士大夫阶层仍有此苦恼，频繁换医几为常态。从整个社会来看，能药到病除的良医都是稀缺资源。这样就不难理解，在时人眼中，走方医虽来路不明，不易被信任，但与一般的坐堂医相比，其疗效却未见得特别低下。而且，由于民众对其期待通常相对较低，反而有更大的宽容度。本文所述的建昌卖药人主要是卖几类自制中成药，既不夸口包治百病，也少有药到病除的奇验，可算平实的医工。

第三，医药负担重，一般家庭难以承担。据邱仲麟研究，明代延医文化日趋精致，病家需要支付的费用名目繁多，而药钱的负担常是决定病家是否治病的关键，平民的经济收入可能赶不上医疗费用的增长与药材价格的变动。^⑤张田生也指出，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清代不同地区医价不一，相对社会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消费水平来说，当时医价较高，尤其是江南地区，其中出诊费和药金是高医价的重要组成部分。^⑥正如一首乾嘉年间的汉口竹枝词中唱的“挂牌医士过千家，治病谁能一把抓，轿子跟班兼药费，寻常小病莫缠他”。^⑦《红楼梦》中刘姥姥也说“我们屯乡里的人，不会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许愿，从不知道吃药的”。^⑧正因如此，许英贤等便打出免费舍药的幌子，但事实是“穷的医好就罢了，富的好了仍旧要钱”，^⑨不过他们

① 《军机处档》，嘉庆二十一年（无月日），档案号：047861。

② 《军机处档》，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档案号：047855。

③ 《军机处档》，嘉庆二十一年（无月日），档案号：047861。

④ 参阅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5-315页。

⑤ 参阅邱仲麟：《诊资与药钱——明代的医疗费用与药材价格》，“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2007年。

⑥ 张田生：《清代的医病矛盾与医家应对》，《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⑦ 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卷5《杂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⑧ 曹雪芹：《红楼梦》（校注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18页。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第367页。

收费通常较为低廉。那些向秘密宗教师父求治的民众也多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①

此外，中国人习惯在亲情氛围的协调下，让疾病在自然状态下得到消除，这种依赖生活化场景治病的医疗模式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感知联系在一起，可以减轻患者的焦虑。^②走方医多来自社会底层，也主要为下层民众服务，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心理基础拉近了医患双方的距离。他们主要提供上门服务，必要时住在病家亲为调治，既为患者提供便利，也满足了患者对以家庭为中心的医疗空间的期待。

清代医家赵学敏曾总结走方医用药的特点：“一曰贱，药物不取贵也。二曰验，以下咽即能去病也。三曰便，山林僻邑仓卒即有”，^③他们擅长利用价廉、易得又有效的药物治病，迎合了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下层的医疗需求。当然，对此不可过度拔高，他们多数人本身医疗技艺有限，“能守三字之要者，便是此中之杰出者矣”，^④同时，鉴于其生计性和游走行医的特殊性，所受道德和舆论约束较少，难免沾染一些江湖习气，常用骗术。

四、余论

本文围绕两起“小事讹案”展开论述。因为种种偶然的因素，一群并不起眼的江西建昌县卖药人得以在官方档案中留下自己的声音，并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除了文中探讨的两大主题，他们的故事还透露出更丰富的历史信息，可以增益我们的历史感和认知维度。

第一，我们可以藉此具体而微地感受微观情境下的历史变迁，如清代人口流动的频繁、长途贸易的发展和全国各地域交流的广泛。摊丁入亩政策的逐步实施使清王朝对民众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放松，自然灾害的频发和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催生出更频繁的人口流动。除了往来各地的生意人，扶老携幼背井离乡的移民也屡见不鲜，有些地区甚至出现较成规模的定向人口迁移，如江西人人湖广，湖广填四川等。这种趋势是当时民众迫于生存压力所做的现实选择，如刘文甫、卢士奇投奔远在安顺、湖广的亲人，曾静在频遭水灾的情况下曾动念移民四川。

清代随着各地经济发展，流通格局发生变化，长途贸易日渐繁盛，地域间的联系得以强化。如许英贤等即经常往来于湖广、贵州的土司地区，与当地土民多有接触，土民分治增加了过往商旅的出行成本和风险，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我们由此更易理解改土归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嘉庆年间诸多卖药人远走关外，江西与关外远隔几千里，其民众原无交集，至此竟可时相往来，可见当时地域交流之广泛。

商贩的主要作用是通有无，而长途贸易和走村串乡的小贩使得商品交换更为广泛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昌人常行千里与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方式将商与医有机结合，并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第二，对下层医者与民间医疗世界的探索可呈现多元的医者面貌，利于我们更全面精细地认识传统社会的医疗面相。首先，我们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民间医者坚韧的生命力。梁其姿指出，“学术的与民间的医学传统分离于漫长的宋、元、明变迁时期，并在此后延续”，^⑤即宋以后，在传统医学的发展过程中，重视文本的学术传统与非学术传统逐渐分离，显然走方医属于民间的非学术传统，尽管面临日益重视文本的医学精英的边缘化，还要应对来自官方的不时“纠

① 参阅邱丽娟：《清乾嘉道时期民间秘密宗教医疗传教活动之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2011年，第315页。

② 参阅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

③ 赵学敏著，鲁照、南垚辑：《串雅全书》，绪论，第10-11页。

④ 赵学敏著，鲁照、南垚辑：《串雅全书》，绪论，第10-11页。

⑤ 梁其姿：《宋代至明代的医学》，《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页。

缠”，但他们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活跃在中华帝国的大街小巷与山野乡间，根本原因即在于他们所植根的传统社会中仍保留着其赖以生存的土壤。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医学知识在具体地方的累积过程并非完全仰赖精英医者与文本化的医统。在建昌卖药人的案例中，师徒授受以及家族传承的模式是典型的非文本传统，虽然精进医技不是其追求的目标和最迫切的诉求，但在一代一代人的口耳相传中，当地医学知识的累积已悄然发生，并对当地民众的谋生方式和日常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References

- Natalie Zemon Davis.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Translated by Rao Jiarong and Chenyao.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15.
- Zhang Haipeng and Zhang Haiying. *zhongguo shida shangbang* (The top ten business groups of China). Hefei: Huangshan shushe, 1993.
- Wang Yuesheng. “Qingzhongqi minzhong zifaxing liuqian zhengce kaocha” (A study based on spontaneous migration policy in the mid-Qing dynasty).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1 (2014).
- Xu Tan. “Qindai qianqi liutong geju de bianhua” (The change of circulation patter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3 (1999).
- Li Ao. “Qingdai guanneiwai maoyi shangdao” (Trade Routes In and Out of Shanhai Pass in the Qing Dynasty). *Manzu Yanjiu* (Journal of Manchu Studies) 1 (1995).
- Angela Ki-che Leung. *Miandui jibing: chuantong zhongguo shehui de yiliao guannian yu zuzhi* (Facing Diseases: the Medical Concepts and Organiz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2011.
- Philip A. Kuhn. *Jiao hun: 1768 nian zhongguo yaoshu da konghuang*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Translated by Chen Jian and Liu Chang.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2014.
- Yu Xinzong. *Qingdai jiangnan de wenyi yu shehui* (The Plague and Society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2003.
- Yang Nianqun. *Zaizao “bingren”* (Remaking “Patients”).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2006.

The Folk Medical World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Itinerant Empirics in Premodern China: Two Case Studies

WANG Jing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ppwj2005@163.com)

Abstract: In the middle and early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itinerant empirics from Jianchang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who were mostly forced into this occupation by economic exigency. Thanks to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ancestral prescriptions, these individuals could make a living outside of Jianchang. Their medical behavior and special features of their everyday life reveals the multiple facets of the folk medical world. Because of their complex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notoriety for cheating others out of money, and especially their frequent travels, their peculiar way of life was considered a potential threat to the ruling order and it occasionally got them in trouble. The complexity and conflicts of the itinerant empirics reflec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ommon people’s struggle for survival and the official prejudice against them.

Keywords: the Qing dynasty, itinerant empirics from Jianchang county, survival stres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eople, folk medical care